

## 完整的人格 偉大的事業

### ——《新亞遺鐸》與錢穆的教育理想

◎ 何方昱

錢穆（1895—1990），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教育家。錢穆一生著書立說，從事教育，目的在於闡揚中國固有文化，恢復中國青年的民族自信心，溝通中西文化。在錢穆廣博浩繁的著述中，有一本書的地位格外重要，意義也非同尋常，這就是《新亞遺鐸》<sup>1</sup>。本書主要以新亞書院出版的《生活週刊》（後改名為《生活雙週刊》，又改《生活月刊》）為資料來源，按出版順序先後排列，匯集錢穆主校十七年中對學生之各種講演以及其他相關資料而成書。《新亞遺鐸》實為記錄新亞書院發展的一部「校史」。此書之所以佔有特殊之地位，更因其與錢穆一生的抱負理想信念息息相關。

1964年7月11日，在新亞書院第十三屆畢業典禮上，錢穆對全校作了正式離職的公開講演，至此，錢穆已經執掌新亞書院十五年。回顧一生歷程，錢穆曾誠懇地說<sup>2</sup>：

我自十七歲到今五十三歲，始終在教育界。由小學中學而大學，上堂教書，是我的正業。下堂讀書著書，是我業餘的副業。我一向不喜歡擔當學校行政工作，流亡來香港，創辦新亞，算是擔當學校行政了，那是在非常環境非常心情下做了。在我算是一項非常的事。

應該說，錢穆創辦新亞，這裏有政治上的原因。1949年，國共兩黨經過四年內戰，勝負即將分曉。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將執掌山河。錢穆作為一名將中國傳統文化奉為圭臬的儒者，對於馬列主義的理論是隔閡而排斥的，因此他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但同時，他對國家仍抱有深沉的愛，他所熱愛的，是那個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國，而非此一新國。另一方面，錢穆創辦新亞書院，並無任何政治目的，只是在盡一名教育家的本分。錢穆秉承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經世救國的抱負，他坦言<sup>3</sup>：

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台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對於錢穆的政治取向，我們可以進行實事求是的批判；對於他因熱愛國家民族而創辦新亞書院的舉動，則應抱有同情之理解。因為錢穆本著一名教育家的責任，為新亞書院竭心盡力，鞠躬盡瘁，將自己最負學術創造力的十五年奉獻給新亞，使其成為海外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重鎮之一。從前半生豐富的從教經驗與自身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洞察與領悟中，錢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育思想，而這所新亞書院，就是錢穆畢生教育思想的昇華與教育抱負的施展。

閱讀《新亞遺鐸》，我們能目睹新亞書院一步步蹣跚前進的步伐，更能體會錢穆創辦新亞的不易與艱辛。

金耀基先生在懷念錢穆的一篇文章中曾說：「先生一生從事學術與教育，創建新亞，也許是他所花心血最多的。先生擔任新亞創校校長達十五年之久，新亞創校初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當時無絲毫經濟憑藉。」<sup>4</sup>此言甚確。

1949年秋，錢穆的朋友在香港創辦了一所亞洲文商學院，請錢穆任院長。一年之後，錢穆打算將夜校性質改為日校，但原校主反對。錢穆遂另向香港教育司申請立案創辦新學校。這就是最早位於香港桂林街的新亞書院。當時新亞的校舍僅是租來的三個單元兩層樓，只有四間教室。而學生生源多半為大陸流亡青年，其中大多數來自難民營中。學生不僅無力交納學費，更是無處容身。有些學生甚至就在學校天台上及樓梯上露宿。最初的新亞書院即是在這樣慘澹困苦中起步的。雖然物質上極艱苦，但新亞的師資力量卻是雄厚的。學校所聘的各教授，均系以前國內政界、學界知名而負時望者，多數為錢穆的老友，不計報酬，願意來此兼課。

新亞書院就是在這種萬分艱難的困境中堅持了四年，1952年至1953年間，新亞書院得到大律師趙冰的協助，獲高等法院批准註冊為非牟利機構，因而可以豁免商業登記。1953年夏，新亞與美國雅禮協會建立了合作關係，旋又得到美國亞洲協會、福特基金會的資助，經濟狀況有所改善。1954年，新亞在嘉林邊道租一所新校舍，較桂林街舊校舍大。而1956年夏新亞第一所新建校舍的落成標誌著新亞正慢慢步入正軌，從無到有，一步步壯大發展。1963年，香港政府有意在原有的香港大學外，另立一所大學，並先選擇崇基、聯合與新亞三校為大學的基本學院。1963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新亞加入其中。1964年夏，錢穆以使命完成為由向新亞董事會提出辭呈。1965年，錢穆正式離職，結束了這段香港辦學生涯。

自1954年夏，新亞得到雅禮的補助費每年二萬五千美元，並即此函謝了台北總統府的贈款。從這以後，新亞的經濟開始好轉，學校規模漸漸擴大。後又得哈佛燕京學社捐贈，得以開辦新亞研究所，並憑著較高的學術水準而為國際漢學界認可與重視。

福特基金會的捐款，使新亞建成了自己的第一座校舍。這座校舍也包含著新亞的辦學理想。全校建築中唯有圖書館佔地最大，課堂次之；各辦公室佔地最少，而校長辦公室更小；學校只有學生宿舍，無教授宿舍。福特基金會派人巡視校舍時，對此亦極為讚賞。這種大與小的區別，表明新亞是將學生的教育放在首位的。

錢穆終生以教書與著述立命，創辦新亞書院卻令他不得不從經濟上考慮與籌畫。對一名學者而言，這絕非易事，但錢穆挺而為之，從未退卻。錢穆曾言：「對於籌集經費，我總是盡力去設法；對於支配用途，我從來不擅作決定，做到絕對經濟公開。」<sup>5</sup>錢穆的努力為新亞的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1960年，新亞校董會所籌募發展科學、充實圖書、增設獎助學金的基金約有港幣十萬餘元<sup>6</sup>。從一無所有到十萬元的積累，這其中包含了錢穆的無限心血，但他卻從未為個人作過打算。1965年，錢穆離職新亞後，希望以個人名義謀一項研究經費來著述他的朱子新學案時，卻頗為猶豫躊躇。錢穆在寫給美國哈佛大學楊聯升教授的一封求助信中吐露了自己的心聲<sup>7</sup>：

穆歷年來新亞遇有乞援機會，總是踴躍為之。今值自身個人問題，卻無此勇氣，究不知此事希望如何？穆之私意，既已抽身乞退，不願再受大學方面之經濟補助。而新亞同人欲在正經濟外另謀助之道，亦非穆私心所安，故懇切欲得外面之補助也。

從這封信中，我們看見了錢穆品節之高潔，為教育事業只知奉獻，不願索取的精神尤令後人感念。

錢穆在困境中創辦新亞書院，經濟上雖然拮据，但卻擁有高遠的志向與理想。錢穆常常告誡新亞學生：「我們學校，由苦難中誕生，由苦難中成長，還將在苦難中向前。我們是有我們的理想。」<sup>8</sup>作為一所在殖民地地上創辦的學校，錢穆從一開始就希望這個學校是一所中國的學校，即「在中國人居住的地區，中國人的社會中，辦學校教育中國的年輕人，將來學生離開學校出去到中國社會上做事。這是我們的一個大理想」<sup>9</sup>。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理想的支持，新亞才一步步壯大，現在已經成為聞名世界的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重鎮之一。

錢穆這種精神的傳播已不僅僅限於香港，更是遠播至美國、歐洲等地，由錢穆的門下弟子發揚光大，其中最負盛名的當屬余英時先生。

余英時曾是新亞書院早期的學生，他目睹了錢師當年創辦新亞的艱辛與不易，更是對老師充滿了敬重。在余英時的記憶中，永遠留下了這樣一幕<sup>10</sup>：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裏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這應該是錢穆在五十年代創辦新亞的真實一幕。此時的錢穆不僅無錢無勢，生活也陷入困頓之中。但經濟上的困難不僅沒有使錢穆退卻，反而令他更堅定了自己的辦學理想。

1990年，余英時在得知錢師辭世的消息後，悲痛之餘寫作一篇〈猶記風吹水上鱗〉，回顧了恩師對自己的影響與塑造，他說<sup>11</sup>：

我這篇對錢先生的懷念，主要限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因為這幾年是我個人生命史上的關鍵時刻之一。我可以說，如果沒有遇到錢先生，我以後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就是說：這五年中，錢先生的生命進入我的生命，而發生了塑造的絕大作用。

這種生命的映照，使余英時在學術上不僅繼承了恩師的衣鉢，更開創出了新的境界。錢穆的另一門生嚴耕望曾評價說：「（錢）先生門人長於學術思想史，各有貢獻者甚多，余英時顯最傑出。」<sup>12</sup>

曾在新亞研究所教書，又在新亞書院教書的逮耀東教授盛讚錢師創辦新亞的功績，他稱新亞書院是「由最初唯恐中國傳統文化在海外花果飄零，到後來在香港桃李滿園。在錢穆的學術和精神感召培育下的一批流亡和本地青年，薪火相傳，對香港人文精神和歷史教育所作的貢獻是不會磨滅的」。<sup>13</sup>

閱讀《新亞遺鐸》，我們能識察錢穆對中國文化抱有的堅定信念，更能體認錢穆對於教育所寄託的高遠理想。

錢穆創辦新亞書院，親自為新亞定了取自中庸的「誠明」二字做校訓，並寫下校規，為校歌作詞。《新亞遺鐸》的卷首部分即高旋新亞學規，新亞校規，新亞校徽，新亞校歌。可以說，新亞最初還是個蹣跚的嬰兒，是在錢穆的呵護與扶持下漸漸變得強壯起來，更是因為錢穆將自己的一番教育理想灌注於內，使它變的活潑而有生氣。錢穆已逝，但學生會一代代相傳下去，因此錢穆的「真精神、真生命並沒有離開這個世界，而延續在無數和他有過接觸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sup>14</sup>。

### （一）新亞書院之精神

錢穆畢生看重教育與文化，並視其為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生命。而錢穆更是從自己對歷史的研究中，認為中國有著自己的大學教育的傳統，比如書院制度就在歷史上發揮過極大的作用與影響。因此，錢穆反對模仿、抄襲外國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錢穆也認為，應該瞭解世界上各種文化的優劣，吸收其優點與長處為我所用。在發揚中國文化的同時，也應溝通中西不同的文化。

由此，錢穆為新亞書院定下的宗旨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sup>15</sup>這是一番極為高遠的抱負，它所提倡的人文主義教育宗旨，是秉承了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精神的核心，即教人學做一人，而一脈相承的；其目的是防止專為各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學究式的專為智識而求智識的狹義的教育風氣與目標。新亞書院具有宏大深遠的抱負，但它的立足點與根基則完全是中國的。

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就是抱著對中華民族必然復興的信念，錢穆篤信，這種信念必將建立在青年「對於中國民族已往歷史文化傳統自信心復活之基礎上」<sup>16</sup>。要發揚這一信念，最重要的工作在教育。新亞的教育宗旨，一是要繼承並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二是要為學生培養個人的生活理想。因為是在苦難中誕生，新亞精神更多表現為在苦難中仍知奮進，仍有理想與希望。

### （二）人生理想之培養

新亞書院學規的第一條就規定：「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sup>17</sup>這體現了學校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更注意培養學生完整而健全的人格。而這種完整人格的塑造過程，也是對學生一種生活理想的陶冶與培養。

新亞要求學生，日常生活應與課業打成一片，內心修養與學業打成一片。在這樣的宗旨下，學校經常舉辦一些技能才藝大賽，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有特長有才能的學生有一個施展才華的空間；另一方面，也可激勵鼓舞其他學生發揮自己的潛在能力，去尋求正當的娛樂，而不僅僅是坐坐咖啡館或去看看電影而已。錢穆就在一屆才藝大賽的開幕詞中強調了新亞追求的生活理想：「新亞不僅是研求學問之所，還當學做人。人生不是單調的、呆板的，而應是新鮮的、活潑的。不但當富有教育意義，亦當富有人生情味。」<sup>18</sup>

除在生活中培養學生的高雅興趣外，新亞實行導師制，可以讓同學和老師有更多的接觸，從而促成自身人格的發展與完善。新亞教育學生<sup>19</sup>：

課程學分是死的、分裂的。師長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應該轉移目光，不要僅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你須透過師長，來接觸人類文化史上許多偉大的學者，你須透過每一學程來接觸人類文化史上許多偉大的學業與事業。你須在尋求偉大的學業與事業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

這也即錢穆積極宣導的學校發展的三個目標：即生活藝術化、課程學術化、行政制度化。

### （三）新亞書院的教育內容

錢穆一向主張大學教育應先主「通識」，再主「專長」，新亞書院的教育內容自然秉承了錢穆的這一理想。在新亞書院的招生簡章中赫然寫明：「本書院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首先注重文字工具之基本訓練，再及一般的人生文化課目，為學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礎，然後再各就其才性所近，指導以進而修習各種專門智識與專門技術之途徑與方

法。」<sup>20</sup>新亞成立之初，僅有文哲學院和商學院，包括文史系、哲教系、經濟系和商學系。規模雖小，但在課程安排上卻有自己的特點，即注重各系一二年級的共同的基本課程，以培養健全的思想基礎為目的，哲學、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語文學等課程所佔時間較多，而專門性質及技術性質之課程，自三年級開始，注重學生自修與導師之間的個別指導，故上課時間較一、二年級為少<sup>21</sup>。

新亞書院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更以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與高尚的生活理想為目標。因此，錢穆認為，藝術是達到此兩項目的的一絕好途徑。新亞在初期因過於窮困而無力提倡。在新亞成立五年之後，狀況稍有好轉，錢穆便極力宣導創辦藝術系，並為之奔走操心。錢穆的夫人胡美琦女士撰文曾談到錢穆當初之動機：「他常說他想辦藝術系的理想並不專在造就專業的藝術家，更求培養全校學生之情趣，希望他們都能領略到一些中國藝術對人生之情味，則對每人品格陶冶上可有莫大之功用。」<sup>22</sup>1959年，藝術專修科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新亞又正式創辦了藝術系。錢穆的理想則是希望新亞擁有「文學院、商學院和藝術學院，並把此三支的課程和興趣，儘量互相滲透，互相潤劑。學文哲藝術的，不要忽略了將來置身社會時之實際事務幹練。學商學經濟的，也不要忽略了各人應有的文哲藝術修養」<sup>23</sup>。

新亞書院一直堅持自己提倡通學的目標，遇條件改善時便努力嘗試。在新亞創辦十年後，錢穆已不滿於已有的成績，為使學生的智識結構更為合理，得到全面的培養，新亞創辦了一所理學院。當時有人質疑，認為新亞宗旨在於提倡中國文化，為何不專一辦好文學院，而要分散精力來辦理學院呢？在錢穆看來，新亞提倡中國文化，但決非抱殘守缺，文化內容理當日求創新，就如同新亞的文、史、哲、藝術各系一樣中西並重。工商實業與自然科學在當前世界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新亞也應同樣重視。可錢穆的出發點卻有所不同，他說：「本校教育理想，不僅是理科、商科方面之各種學術技能可以增進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之內容，抑且重在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可以對理科、商科各門學問賦予以更新之使命，開創其更新之前途。」<sup>24</sup>因此，創辦理學院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中國文化開創新路。

新亞書院在成立之初，就開辦了自由的學術講座，每週一次，全部免費，不僅歡迎新亞的學

生聽講，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都可以來旁聽。新亞邀請各方面的專家，作有系統的學術講座，範圍涉及到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各個部門。這個講座持續了多年，對於新亞學生與整個香港社會的影響都極深遠。

錢穆在香港，一個英國的殖民地，卻又是中國人的社會，創辦新亞，就是希望能讓中國青年懂得並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價值。有了這樣的共識，學校就可以給青年們一個正確而明朗的人生理想。在這種人生理想的指引下，個人才會有明確的奮鬥方向，並以培養情趣，提高境界為一生追求。在錢穆看來，這就是人生的最大幸福與最高享受。

### 三

閱讀《新亞遺鐸》，能收穫錢穆畢生對於中國文化的體悟和個人對學問的見解。

這次三聯版的《新亞遺鐸》較之台北聯經版，更完整的收錄了錢穆在新亞書院及一些文化教育機構的演講稿，尤其是錢穆在新亞研究所歷次學術演講討論會上的講詞。這些講稿後都收錄到《錢賓四先生全集》中相關論著中。在《新亞遺鐸》中讀到這些寶貴的記錄，縱然無法體會錢穆先生博大精深的學問體系和學術追求，卻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的效果。

錢穆少年失學，十八歲即為人師，從此步入一條自學苦涯。錢穆在黑暗中摸索總結，幾十年來堅持不懈，最終探得光明與希望。錢穆在執掌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的時候，總結了自己一生做學問的方法和心得體會，慷慨地傳授于學生。對後輩學子而言，這些方法如同一顆啟明星，照亮了學生未來的學問之路，可以使後來人跟著先哲的腳步足跡，少走些彎路，多些明見。其中〈擇術與辨志〉、〈關於學問方面之智慧與功力〉、〈學問與德性〉等篇尤應仔細閱讀，因為這些見解確實如同燈塔一般，照亮了那些仍在學問海洋中茫然苦游的心靈。

從其他的一些演講詞中，還能體會到錢穆為中國傳統文化追魂的苦心。錢穆先生的一生，正處在中國劇變的一個世紀中，不僅內憂外患，形勢迫人，且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猛烈衝擊的時期。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中，中國社會不得不經歷陣痛、恥辱和挫折。這是一個古老民族在新的歷史時期的蛻變過程，步履艱難卻又蹣跚向前。

錢穆出生在這樣的時代，對個人而言是不幸的；錢穆一生以教書為正業，以讀書著書為副業，不僅留下了豐富深刻的學術思想，更為時代樹立了一位為人師的典範。錢先生畢生懷抱著對國家民族復興的信念，要為一個在風雨飄零的時代中落魄的故國招來靈魂與精神，這樣的抱負與理想，對此時代的中國而言又是何等之幸！

錢穆的抱負之落腳點在教育，他的教育實踐之長久深遠，鮮有人能與之匹比；他的教育思想伴隨著其教育實踐，在繼承傳統教育思想的基礎上，又體現著鮮明的時代特徵。

錢穆積極宣導重建中國傳統教育思想之精神，即一種以道德為核心的人文主義教育，重新確立教育中人的主體地位，對於今天仍有深刻的指導意義。錢穆提出的道德實為一種人生行為的實踐，他主張教師應承擔起傳道的重任，教育應該尊重並發揮人的自由，並積極宣導一種人生理想的確立，這些對於醫治今天的教育頑疾仍不啻為一劑良藥，值得我們思考與借鑒。

一本七百多頁的《新亞遺鐸》，厚重而深沉，讀起來卻引人入勝。因為多是錢穆在新亞書院各個場合上的講演詞，語言生動活潑又淺顯明白，較之錢穆其他學術著作而言，可讀性更強。掩卷之餘，更發人深思。作這樣的一次心靈之旅，心智得以提升，性情得以陶冶，人，

也會變得剛毅堅強又溫文爾雅。

## 註釋

- 1 錢穆：《新亞遺鐸》（北京：三聯書店，2004）。此次大陸出版的《新亞遺鐸》是以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的版本為底本。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出版的《錢賓四先生全集》中也收入此書，為第50卷。唯全集中的《新亞遺鐸》為避免重複，將已經收入全集其他專書的二十三篇文稿抽出不錄，僅在目次中保留篇目。由此，三聯版《新亞遺鐸》較聯經版更全面。以下出自《新亞遺鐸》的註釋均為北京三聯版。
- 2 錢穆：〈有關穆個人在新亞書院之辭職〉，載《新亞遺鐸》，頁665。
- 3 錢穆：〈附錄十一：我和新亞書院〉，載《錢賓四先生全集51：八十億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458。
- 4 金耀基：〈懷憶錢穆〉，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無錫縣委員會編：《錢穆紀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100。
- 5 同註3，頁462。
- 6 同註3，頁462。
- 7 錢穆：〈致楊聯升書〉，載《錢賓四先生全集53：素書樓餘審》，頁226。
- 8 錢穆：〈告新亞同學們〉，載《新亞遺鐸》，頁21。
- 9 錢穆：〈新亞二十周年校慶典禮講詞〉，載氏著《新亞遺鐸》，頁709。
- 10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載《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6。後此書以《錢穆與中國文化》為書名，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出版。內容略有刪改。
- 11 同註10，頁13。
- 12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載《治史三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282。
- 13 逮耀東：〈夫子百年—錢穆與香港的中國文化傳承〉，載李振聲編：《錢穆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120。
- 14 同註10，頁15。
- 15 錢穆：〈招生簡章節錄〉，載《新亞遺鐸》，頁12。
- 16 錢穆：〈敬告我們這一屆的畢業同學們〉，載《新亞遺鐸》，頁28。
- 17 錢穆：〈新亞學規〉，載《新亞遺鐸》，頁1。
- 18 錢穆：〈天才技藝大會開幕詞摘要〉，載《新亞遺鐸》，頁103。
- 19 同註17，頁2。
- 20 同註15，頁12。
- 21 錢穆：〈新亞書院沿革與概況〉，載《新亞遺鐸》，頁14。
- 22 錢穆：〈附錄，敬悼青瑤師，胡美琦著〉，載《新亞遺鐸》，頁746。
- 23 錢穆：〈知識、技能與理想人格之完成〉，載《新亞遺鐸》，頁149。
- 24 錢穆：〈第十屆畢業典禮致辭〉，載《新亞遺鐸》，頁310。

何方昱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現師從姜義華教授，研習中國近現代教育史、思想文化史。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七期 2005年4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七期（2005年4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